

熊完一生大事记

——楚考烈王记事⑰

沈国冰

楚文化大家谈 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楚考烈王熊完(公元前290年—公元前238年),半姓,熊氏,名完,享年52岁。公元前263年——公元前238年在位,担任楚王25年。

楚考烈王熊完是楚国第39位楚(君)王。

1.公元前290年 熊完出生

这一年,熊完出生于楚国都城郢。郢,古邑名,位于今天的湖北省江陵县北十里处,即纪南城。楚武王从(河南)丹阳迁都至此,楚国在此建都400余年。

公元前290年,也就是熊完出生的那一年,时值周赧王二十五年,秦昭襄王十七年。

2.公元前278年

这一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都城郢,楚顷襄王迁都陈城(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

3.公元前272年

楚国和秦国讲和。楚顷襄王迫不得已,同意秦昭襄王的要求,把太子熊完送往秦国都城咸阳做人质,时任楚国左徒的黄歇受楚顷襄王重托陪伴熊完一起入秦。

这一年,熊完17岁,黄歇42岁。从此开启熊完、黄歇他们两个人之间长达35年的生死之交、师友君相、疏离分道、同年归逝的旷世传奇。

从时间上推算,至少在公元前272年之前,熊完已被楚顷襄王立为楚国太子,成为储君。

4.公元前272年——公元前263年

这10年,熊完在秦国做人质。期间,秦昭襄王把女儿嫁给熊完,熊完成为秦昭襄王的正牌女婿。熊完和秦国公主生育一个儿子,取名熊启。

5.公元前263年 熊完接任楚王

获悉父亲楚顷襄王病危,但秦昭襄王不同意熊完回楚国探望。熊完在黄歇冒死帮助下,从秦国逃回到楚国。

这一年秋天,楚顷襄王去世。熊完继承楚王之位,成为楚国第39位楚(君)王。

6.公元前262年 楚考烈王元年

这一年,为楚考烈王元年。楚国开启长达25年的考烈王时代。

这一年,楚考烈王任命黄歇为楚相,将淮北十二县作为封地赐予黄歇,封号



春申君。

秦昭襄王试探楚考烈王对秦国的战略态度,楚考烈王清醒地认识到,秦、楚的实力已经相距甚远,如不改变对秦策略,楚国将难保。楚考烈王表示愿意事秦,并将夏州割让给秦国,以表达诚意。以土地换和平,楚国赢得短暂的和平时间,国家和民众得到喘息和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发展,国力开始渐渐恢复和增强。

秦昭襄王采纳并实施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将兵锋集中指向韩、赵、魏。

这一年,秦、赵长平之战爆发。此战,乃秦将白起的封神之战。“纸上谈兵”即源于此。

长平之战,也是秦、赵之间的战略对决,此后,赵国元气大丧,再也无力挑战秦国。

7.公元前261年 楚考烈王二年 楚考烈王任命黄歇为将,攻打鲁国,夺取鲁国的徐州。

8.公元前259年 楚考烈王四年 秦将白起携长平之战胜利锐气,进围赵都邯郸,意图一举灭赵。邯郸之战爆发。

9.公元前257年 楚考烈王六年 邯郸被秦军围困2年,形势危急。赵国向楚国、魏国求救。

赵国平原君赵胜带领包括毛遂在内的20名门客,通过好友楚相春申君黄歇,向楚考烈王求援,请求楚国出兵救赵。

毛遂自荐“脱颖而出”“一言九鼎”皆源于此。

考烈王命春申君黄歇、景阳率领楚

军出兵救赵。

魏国信陵君窃取兵符,率领魏军救赵。

楚、魏联军会师邯郸,大败秦军,邯郸之围解除。

楚国和考烈王的影响力大幅度提升。

秦、楚关系破裂,彻底翻脸。

10.公元前255年 楚考烈王八年 楚考烈王派春申君黄歇出兵攻打鲁国,把鲁顷公从鲁国都城迁出,封在莒地。

楚国重新强大起来。

11.公元前253年 楚考烈王十年 楚考烈王将都城从陈城(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迁往钜阳(今安徽省阜阳市太和与县东)。

据考证,楚国的都城仍在陈城,钜阳只是陪都。

12.公元前251年 楚考烈王十二年 秦昭襄王去世,楚考烈王委托春申君黄歇前往吊丧。

这一年,楚将景阳去世,楚失一员名将。

13.公元前249年 楚考烈王十四年 楚灭鲁。鲁顷公去世,楚考烈王没有允许鲁国袭封新的鲁王,鲁国彻底灭亡,鲁国地域被纳入楚国版图。

14.公元前248年 楚考烈王十五年 春申君黄歇主动提出献出自己的封地淮北十二县,改设淮北郡,请求改封到吴地。楚考烈王同意。

据考证,至少在公元前248年,甚至

更早,楚相春申君黄歇即受楚考烈王指派,开始修建寿春,意图东迁,定都寿春。

这一年,成为浙江省湖州市的建城之年。春申君黄歇被称为湖州的开城之祖。

15.公元前246年 楚考烈王十七年 魏、楚发生军事冲突,楚败。

16.公元前241年 楚考烈王二十二年 楚、燕、赵、魏、韩五国联军攻秦,推举楚考烈王为纵长,楚相春申君黄歇为联军总指挥,史称第五次五国攻秦。

楚考烈王把此次军事行动的失败归责于春申君黄歇,日渐疏远他。

考烈王和春申君黄歇失和。

这一年,为避开强秦,楚考烈王把都城从钜阳东迁寿春。

17.公元前238年 楚考烈王二十五年 楚考烈王在寿春去世,享年52岁。

17天后,从吴地(今苏州)日夜兼程赶往寿春,前来吊丧的黄歇,进入寿春城南门(棘门)门洞,被李园设伏的刺客所杀,黄歇的头被砍下,扔在南门外。

黄歇被刺身亡,时年76岁。太子熊悍继位,史称楚幽王。

李园,替代黄歇,成为楚相。“当断不断,必有后患”“门里人”典故皆源于此。

这一年,22岁的秦王嬴政平定嫪毐之乱,开始亲政。秦灭六雄,一统天下的序幕开启。

《淮南子》书名嬗变

丁立福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 “淮南历史文化精英” (第八季)大型征文

《鸿烈》改称《淮南》:歪打正着

仔细研读《淮南子》原文就会发现,最初的书名应是《鸿烈》;原作最后一篇《要略》有言“《泰族》者,横八极,致崇高,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经古今之道,治伦理之序,总万方之指,而归之一本,以经纬治道,纪纲万事……故德形于内,治之大本。此《鸿烈》之泰族也”——这是在概述该书第20篇《泰族》时的用语,表明此处所言乃《鸿烈》第20篇的主旨,由此推断该书最初确实由编著者自己取名为《鸿烈》。后人改称《淮南子》,显然是将刘氏之书视为诸子百家流派之一,从而体现出他们对该书的认可和尊敬。在这个过程中大致有两个拐点,最终完成由《鸿烈》到《淮南》再到《淮南子》的约定俗成。

先来论述第一个拐点,西汉目录家鼻祖刘向和刘歆父子弃《鸿烈》而启用《淮南》,可谓“歪打正着”,迈出了刘氏书名成为《淮南子》的关键性第一步。公元前26年,汉成帝鉴于宫廷藏书散佚残缺甚多,便下诏遣派谒者陈农组织人员到全国各地搜集遗书,时任光禄大夫的刘向自然就被诏去总负责校勘和整理这些征集到的遗书,并专门负责赋诗、诸子及经传等典籍,此外还与其子刘歆专门负责校阅天禄阁藏书。在当下,刘向是最有可能目睹朝廷上上下下所有图书全貌的第一人,包括全国各地搜集到的遗书、朝廷原有的藏书乃至不示于外的秘书,都需要经其手整理和登记;当然校勘、整理这些图书也是一件浩大、庞杂的工程,刘向自此耗尽一生,后由其子刘歆继续总领书籍的典校整理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传至唐宋就基本散佚了,现今只能根据《汉书·艺文志》来推之其梗概,但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分类目录书和目录学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至少刘向父子应该见过《鸿烈》,然而当年刘安“谋反”已成板上钉钉,其书《鸿烈》业已成为秘书乃至禁书,“鸿烈”已经成了敏感字眼,最好弃而不用,此其一。其二,刘向父子当年校勘整理书籍时不仅要梳理分类,还要经常给书命名,因为古人的书往往没有书名。当年所藏刘安著述不在少数,最好能有一个统一的指称,再细加分类;于是,统一以《淮南》称之,再分别命名为《淮南内》《淮南外》《淮南诗歌》《淮南王赋》《淮南王群臣赋》《淮南王兵法》《淮南杂子星》等,最后按其性质和特征分别归到相应的部和类中去,似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其三,《淮南内》由于其一水平的水平和较高的声誉,在刘安所有著述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成为刘安所有著述的代名词;反而推之,《淮南》有时也用来专指《淮南内》,即《鸿烈》,尤其是在喜读此书封建士大夫们交流阅读感受的过程中。

当然,这仅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推测,毕竟在现今出版的《汉书》和《别录》相关著作中,尚未见到刘向把《鸿烈》改称为《淮南》的明晰记录。再退一步说,刘向成为把《鸿烈》改名为《淮南》的始作俑者是毫无疑问的,现录东汉高诱校勘《淮南子》时所撰《淮南鸿烈解叙》中的相关文字为证:“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刘向父子弃《鸿烈》而改名为《淮南》,不管是出于形势所迫还是分类编目考虑,

都在某种意义上启迪了《鸿烈》的另一种命名,直至约定俗成成为《淮南子》,其功不可没。

承《淮南》启用《淮南子》:正打正着

东汉校勘大师开始承袭书名《淮南》,继而使用《淮南子》,可谓“正打正着”,为刘氏之书约定俗成成为《淮南子》奠定了最为坚实的一步,此为前文所论两个拐点中的第二个拐点。有学者根据《西京杂记》卷三言“淮南王著鸿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推论,《淮南子》称“子”肯定始于“《西京杂记》问世的魏晋时代”。目前来看,这一论断有点过时了,原因有二:其一,《西京杂记》的原作者极有可能是西汉末年的刘歆而非东汉晋年代的葛洪,葛氏仅是辑抄从而为世人所知罢了,而且《西京杂记》所记多为西汉年代的遗闻逸事。其二,《淮南子》称始于魏晋时代,不太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尤其与东汉中后期重新重视道家思想不太吻合。

客观而言,当刘向父子改《鸿烈》为《淮南》,并将其归为诸子部或略时,稍后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就极有可能像《老子》《庄子》《孟子》《墨子》等诸子书名一样尊称其为《淮南子》。这一可能在历史发展到东汉王朝时成为现实:首先,西汉年间的帝王将相与普通百姓一样都随之淹没在历史尘埃中,东汉人没有了刘安“谋反”时的政治形势和顾虑,自然会有一部分人开始逐步接触、关注、阅读淮南王的著述,从中汲取养分后不禁会感叹其博大精深,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敬意,淮南王的形象会渐渐高大起来。其次,“子”在古代可特指“有学问的男人”,成为男人的美称。在秦汉年代,士人崇尚诸子学思想,有喜称“子”的传统和做法,如辞赋大家扬雄经常自称“扬子”,甚至刘向父子在整理图书目录时都乐意把诸子著述单独列为一类,称为“诸子部(略)”。细加考虑就会发现,“淮南”一词概括性较高,既可指王国“淮南”,也可指王侯“淮南”,还可以指刘安的这部书“淮南”;于是,喜欢《淮南》的部分士人交流时就会在“淮南”的后面追加一个“子”,既可显示对淮南王的敬意,又可指称这部高大上的鸿篇巨制。最后,东汉后期社会政治危机加剧,“儒学开始衰微,老庄思想重新被发现”,此时主旨近“道”的《淮南子》也就开始受到重视,注解《淮南》并宣扬其“道”成为一种形势需求。于是许慎、马融和高诱等校勘大师相继选校《淮南子》并为之注解,人们也随之争相阅读学习。由此推之,东汉后期《鸿烈》开始受到欢迎和尊重,口头交流中尊称《淮南》为《淮南子》,继而在正式场合中使用开来应该是自然之事。

曾有学者考证,东汉时期“桓谭的《新论》、王逸的《楚辞章句》、《吕氏春秋》高诱注都有使用《淮南子》之名的现象”。这表明,刘向父子所定书名《淮南》已经过渡到《淮南子》,并由口语正式进入书面语。《淮南》被尊称为“子”书,一下子就凸显出了《淮南子》的学术水平和地位,大家也就迅速地接受并使用开来,表明世人对淮南王安学术贡献和历史地位的认可。

总而言之,包括高诱在内的校勘大师,有些直接给《淮南子》校注,有些在其他语言文字工作中承袭书名《淮南》,继而使用《淮南子》,有意将士人对淮南王及其著作的敬意凸显出来,也是有意肯定淮南王及其著作的学术水平和地位,达到了比较好的传播效果,可谓“正打正着”,居功至伟。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五季)征文

楚大地上的野草,在烽火和鲜血中,一片片,绿了又枯,枯了又绿。生活与美的交织,在千年的楚人心中吟唱,从屈子崇高悲苦的殉志沉江,到淮河两岸奔腾的春申战马,历史长河书写了独特的楚文化,炉冶的楚大鼎中,煦春化育,铸锻物华,为世人展现流水之采采,远春之蓬蓬。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盛和经济繁荣,楚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箪路蓝缕”的景况早已成为过去。楚国贵族生则厚养,死则厚葬。楚文化不仅在青铜艺术方面可与中原文化媲美,而且以巧夺天工的漆木器和丝织品开拓了工艺美术的新境界。

楚人对美好的追求也是独特的,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藏品中有战国时期楚国的“彩绘鸟纹漆盘”。盘呈圆形,以红、

黄、白三色漆彩绘纹饰。盘中央用黄色漆绘制两只呈环绕状的风鸟纹,向外为一周红色漆勾线黄色漆画叶的草叶纹带,再向外是一周红漆勾线“S”和点纹相间的纹带,最外围饰一周花鸟纹带,两鸟中间用黄漆勾线绘饰一束花卉,盘沿一周用红漆绘制四条线纹中央三段波折和四线相间的纹带。此盘画工精细,色彩艳而不俗,是战国时期少见的一件漆器。

楚服有短衣、长袍、单裙和胫衣四类。楚人在穿着服饰上,贵族们追求的是华美和新奇。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大量无比精美的丝织品,有大幅龙凤纹绣绢、神兽纹织锦、龙虎纹绣罗、蝉翼轻纱、花鸟细涂、锦面麻鞋、帛画、绣衣木俑和轻盈华丽的各种衣着,上面神奇对称的纹饰,犹如天空的

楚人生活与审美

王晓珂

彩霞、地上的鲜花,神话中的仙人瑞兽,尽收天上人间的旖旎景色,这些丝绸在地下埋藏两千三百多年,出土时色泽鲜艳,灿烂夺目。楚国男性到了成年都着冠,称之为“楚冠”或“南冠”。文献记载的有切云冠、远游冠、解冠、鞋冠、长冠、皮冠等各式楚冠。各地楚墓出土的木俑有平民仆隶所着的形制简单的扁圆冠,有老年贵族女子所着的用绢、锦等缝制的凸圆冠。《离骚》中所描写的“高余冠之岌岌兮”,以及《九章·涉江》中所描写的“冠切云之崔嵬”,即是贵族男子所戴的高冠。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中所见的高冠,即切云冠。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帛画中人物所戴的冠,应为长冠。据《通典》释:“长冠,汉高帝采楚制。……形如板,以竹为里,亦名‘斋冠’。后以竹皮为之,高七

寸,广三寸,后人谓之鹤尾冠也”。

战国时期的楚国是一个物产富饶的国家,司马迁曾夸耀楚国“饭稻羹鱼”“果腹赢蛤,不待贾而足”“无饥馑之患”。楚人所穿的鞋,文献中记有玉履、珠履、豹舄、编舄等,都不是寻常之物。从阳金山山、江陵雨台山和马山等楚墓中有麻鞋,江陵藤店墓还出土了一双皮手套。楚人贵族女子椎髻于脑后,平民女子则垂髻于颈。江陵马山墓年约40余岁的女性墓主,使用了假发,可见她生前注重修饰,喜爱美容。

楚人服装典雅漂亮,佩戴各类华丽饰物。《楚辞·离骚》诗曰:“长余佩之陆离”,“佩缤纷以缭兮”,以及“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楚墓

中出土了各类饰物和铜镜,史书记载的佩饰有琼弁、玉璆、绿佩等,反映出楚人注重仪表、讲求华美的生活与审美。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有诗吟咏楚王宫与郢都的繁华景象:“年年三月飞桃花,楚王宫里斗繁华。云连蜀道三千里,柳拂江堤十万家。”

文化鼎盛期的楚人,饮食嗜好,楚辞记载调味以“大苦咸酸,辛甘行些”为佳,饮料以芬芳为美。其祭祀和日常的食物,“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饗,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筵豆、醢醢则上下共之”。

《楚辞》中“挫糟冻饮,耐清凉些”和“清馨冻饮”等诗句,以及随州出土的冰鉴,说明夏日的楚人贵族喜欢冰酒。并且对食用器具也别有一番讲究,

出现了设计别具匠心、造型庄重浑厚的冰鉴以及用于郊游野餐的全套餐具盒等。楚墓中除发现各种不同质地的勺、匕外,还出土了年代最早的竹箸。

楚人有充沛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审美观。楚人席地而坐,但不席地而卧。楚墓出土的几、案均为矮腿,是依楚人席地而坐的习惯设计制作的。孟尝君出巡五国,到达楚国时,楚王要送给他一张用象牙制成的床,说明了楚国制作工艺的高超。

“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在楚国帛画中早已呈现。长沙楚墓出土两幅人物龙凤帛画,是现知年代最早的国画,是战国中期楚人的手笔。帛画线条刚劲而纤柔,既酣畅又潇洒。

楚国的生活审美,也表现在习俗喜好上。楚人对身材、仪表都有较高的追求。楚人以细腰为美,楚墓中常有束腰用的带钩和细腰的木俑出土。到楚礼器铜鼎和仿铜陶鼎的足皆细而高,且有棱有角,而同时代的中原的鼎足粗而短,且敦实浑厚,体现了楚人与中原诸夏不同的生活与审美。

江淮新运河
孟伟摄